

人生感悟丛书

心 想

韩少功



天津人民出版社

韩少功

心 想

天津人民出版社

心 想

韩少功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2插页 110千字

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

ISBN 7—201—02453—1/G·1100

定 价:8.30元

序

——致青年朋友

随着印刷业的发达,书是越来越多了。对于很多人来说,书越来越多的时候,读书倒会变成一件特别艰难的事情。这有点像进食,经常饿着固然不好,一旦佳肴满桌豪宴频开,厌食、闹肚子、肥胖症之类健康的大敌也随之而来。现代人的无知不再表现为一无所知,恰恰相反,更多地表现为无所不知。愚昧往往不再与孤陋寡闻同义,恰恰相反,更多时候倒会呈现出博识多闻的形态。书不等于知识,知识不等于智慧。以为只要书读得多,人类的智商就会同步增长,这就如同以为,革命理论最多的时代革命最彻底,爱情流行歌最喧嚣的时代爱情最纯洁,本身已无多少智商可言。这种浅薄的乐观主义被很多现代人惬意地接受和传播,本身就是愚昧的开始。

知识是智慧的产物。但如果失去了对知识的警觉和

怀疑，如果失去了直接面对生活实践的独立思考和心智的创造力，知识就会成为词句的沙漠，反过来枯竭智慧。也许，这是关于知识的知识，也是最重要的知识。古人说：读书知其长还须知其短，焉知其长。看不到知识的局限性，必定与知识无缘。因此，当你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你出自深思熟虑的挑剔和批评，正是笔者所希望的。

韩少功

1995 年 12 月

目 录

世界	(1)
看透与宽容	(26)
灵魂的声音	(33)
在小说的后台	(39)
记忆的价值	(46)
无价之人	(50)
伪小人	(56)
处贫贱易,处富贵难	(61)
作揖的好处	(67)
阳台上的遗憾	(72)
夜行者梦语	(76)
性而上的迷失	(89)
心想	(108)
多义的欧洲	(130)
米兰·昆德拉之轻	(137)
笑的遗产	(151)
母亲的看	(159)

我家养鸡.....	(162)
收水费.....	(167)
安妮之道.....	(176)
美国佬彼尔.....	(181)
仍有人仰望星空.....	(191)
海念.....	(203)

世 界

很多年前，我在湖南的汨罗江边插队，常听当地一些农民聊天。在我那个村子的附近，山头还有抗日战争时留下的战壕，偶尔还能在草丛或荒土里找到一颗锈垢缠裹的颗粒，磨一磨就亮出铜泽——是子弹。子弹证实了史料上的记载，那里曾经发生政府军截断长岳公路的阻击战。

农民把兵称为粮子。农民说日本粮子好可怕，说那时候一个受伤的日本粮子进了村，可以吓得全村的男女老少跑个精光。

对付这个兵，还是个掉队的伤兵，上百号男女没有人想到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我对这种说法大为吃惊。我从农民的笑谈中洞见了另一种真实，一种耻辱感挥之不去的真实。我很不情愿地

明白，这个民族自清末以来一次次成为失败者，除了缺少工业，还缺少另外一些东西。

二

多少年后，1989年的法国巴黎曾经有一个酒会。主人是来自台湾的一位文化高官，主宾则是大陆一些有名气的文化人，还有少数几个法国朋友应邀作陪。主人明明可以说一口漂亮的国语，也明明知道他的主宾们听不懂英语，但更愿意用英语致词演讲。译员当然是有的，但只把英语翻成法语，把面面相觑的一大堆中国人晾在一边。

一个中国留学生觉得不对劲，准备提请主人注意到这一点。居然有一位作家拉住了他的衣袖。

“不要非礼，这可能是人家的习惯。”

一种奇怪的形势就这样持续下去。主人对主宾们致词，压根不在乎对方能否听懂。这种决非疏忽的轻慢，竟然有受辱者毕恭毕敬地容忍，而且不准别人代为反抗。

中文是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所使用的语言，包容了几千年浩瀚典籍的语言，曾经被屈原、司马迁、李白、苏东坡、曹雪芹、鲁迅推向美的高峰和胜境的语言，现在却被中国人忙不迭视为下等人的标记，避之不及。

沉默的一群仍然听不懂，但没有人退场，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用这种双方都听得懂的语言说一句：

“先生，请你说中文。”

三

听说以上情景的那一刻，我猜想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从文化开始的，从语言开始的。侵略者从来明白，攻城莫若攻心，而一个人的心里只有语言，精神唯语言可以建筑和守护。

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已经描述过向侵略者缴出语言的痛苦。清王族最终没能征服中国，也是被中文的汪洋大海淹没，退出紫禁城则只是迟早的问题。走出十九世纪的黑非洲，身上最深的伤痕，也许不是来自帝国的入侵和掠夺——外来的实业家固然心狠，但有时候留下一点科学技术的扩散，留下一些大楼或公路，对殖民地的经济多少有一点客观的刺激。比较起来，帝国最大的罪恶，影响最为深远的罪恶，莫过于语言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残疾。文化消解了，就像灵魂熄灭了，一个民族即便有再强健的体魄，也只能任人宰割，形如散沙，没法凝聚出坚定的行动和旺盛的生命。陷入经济上的长久困局，也在所难免。

美国长篇小说《根》里面有一段情节：主人公一次次逃亡，宁愿被抓回来皮开肉绽地遭受毒打，不惜冒着被吊死的危险，决不接受白人奴隶主给他的英文名字，而坚持

用非洲母语称呼自己：昆塔。可惜，只剩下这样一个血淋淋的名字，一代代秘密流传下去，也只具有象征意义。作为昆塔的第七代后裔，小说作者只能用英文深情地回望和寻找非洲。白人强加给他所有同胞的基督福音，无法解决那一片大陆上累积的问题：债务、战乱、艾滋病，还有环境和技术。

中国的很多字也有血迹，只是已经褪色，已经被人淡忘而已。海峡两岸的这些高官和文豪，在这一天的酒会上主动和自愿地背弃了中文。事情很明白，这些聪明人感觉到中文没有足够的含金量，至于还含注多少尊严，多少热诚，多少创造的智慧，也并非不成为问题。他们为了显示与自己领带和皮鞋相称的教养，没有必要对这种下等的语言亲近。

四

文明是一条长长的河，不断地有细流的渗去和汇入。生的就生了，死的就死了，命运严酷无情。没有充分理由断定，某种文化将长盛不衰万世永存。南危地马拉的丛林里，玛雅文化只有废墟残存供后人凭吊和猜测。当年不会比汉语覆盖面小的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兴起之后，也呼啦啦崩溃。

辽阔的中国，期待着一个奇迹般的再生。从五四运动

或更早的时候开始，一场文化重造的百年苦斗，从西来的民主和科学中获取热能，历经外部的封杀和内部的自戕，把数以亿计的人导出了腐朽王朝的暗影。但是压力和危机尚存。我们还没有今天的孔子和庄子，今天的《离骚》和《诗经》。我们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大学群落，但还没有自然科学里的爱因斯坦、海森堡，没有哲学里的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没有历史学里的汤因比，没有经济学里的亚当·斯密、凯因斯，没有文学里的托尔斯泰、卡夫卡，没有艺术里的毕加索、贝多芬……一句话，我们联系实际发展他人的学说甚至有足以自豪的实践，但从总体上看，我们毕竟还少有影响和推动世界潮流的当代文化巨人。描述一个文化上的东方强国，还只能含糊其辞。

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地承认自己的学生地位。严格地说，我们的很多学科，至今还在靠西方的输血而生存。我们不少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也许因其种种无法摆脱的历史限制，更像一些介绍家、鉴赏家、综述家、资料整理家，而不是创造家。他们即便干得很不错的时候，也只是称职的导游员或节目主持人，对各种节目融汇于心，但是没有自己的节目，或者节目不够完整和精彩。他们是必不可少的，被尊为区域性的名人，但他们还无法被纳入全球性的文化视野——即使把有些人对东方的歧视因素排除出去。现代中文的价值含量，还没有使中文达到人家必须尊

重,必须使用,必须广设课程加以学习的程度——虽然近来的情况稍好了一些。

对一个人,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出产,希望有更多的独特性的创造,这永远不是什么苛求。

五

相反,一百多年后,目下正在大举炒入西方市场、正在被某些西方人争相喝彩的,却是另一类中国文字。有几部志在票房电影,有几本通俗的自传性小说和一堆花边文章,作者可以在艺术上怎么平庸就怎么干,唯独在有一点上却是绝对精明和清醒:那就是要挤眼泪,要全力展示中国的乖戾,残酷,可笑,暗无天日,不近人情,不可药救,其文化背景该遭天谴,以便满足某些西方人的怜悯欲和种族优越感。他们像一些职业乞丐,进入都市之后,被财富和作派吓得两眼发直,大气都不敢出。他们常常选择最省力气的角色:衣服一定破烂,头上一定要有脓疮,最好还能在街头亮出血糊糊的伤口和畸形的断臂残足,以便招来好奇的围观,让路人施舍小钱。

为了使乞讨有一个神圣的名义,他们学会了谋算政治。也是在法国,一个装着深刻表情的演讲厅里,优质音响设备正在传出哪怕最微弱的咝咝气声。一位记者提问:“在现在的中国,还有没有人因为写小说而坐牢?”

我身旁的一位女作家犹豫了片刻，斟酌着说：“我见到过一个囚犯，他说，他写过小说。”

回答当然很精明。把“因为写小说而坐牢”偷换成“囚犯写过小说”，含混之际，既满足了记者对答案的预期，又不违背事实。既以貌似大胆的言论在外面出彩，又没有超出底线，不至于因为言论失实受到国内的追究。让记者高兴是重要的，舆论意味着自己的知名度、出版机会、访问邀请和美元。暂时不得罪中国官方也是重要的——假如自己还打算回国或者出任什么委员，还打算踏上红地毯。

镁光灯闪亮，这位作家后来果然被记者们热烈包围。

这样的成功，培养着西方人的知识胃口，这种胃口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惯性刺激。于是一时之间，一批批国人前去就范，一面对洋人就嘴巴不听使唤，一个劲往话筒里喂入谎言。他们在西方混多了，更懂得在专业性的诉苦之余，还应适当调佐一点雅兴，比方穿戴上西方人爱看的佛珠或苗族图案，比方刚才声称自己在文革中被抄家，一切家产荡然无存，转眼又从怀中掏出一只偷偷从工艺商店买来的小脚绣花鞋，奇货可居，声称那是祖母的遗物，并为此当众流下眼泪。他们明白不少西方人在吃饱牛排喝足啤酒之后，要像看橄榄球或摩托赛一样来看绣花鞋——而且缺乏足够的中国经验来辨别真伪。

1994年春，我在国外的书店、影院以及友人们的交

谈中,对这种汉奸文化的越来越多以至铺天盖地感到震惊,对一般国民在几个汉奸炒热走红之后普遍的羡慕或麻木感到震惊。我不知道正派的西方人会如何看待这些。我一点也不想掩盖伤疤,不否认中国确有很多悲剧给这些乞讨者提供了理由和机会,那些悲剧制造者更应该受到指责。我也不认为民族的面子有什么要紧,不觉得一见家丑外扬就需要恼怒。但我还是觉得下跪的姿态刺目。

不是一般的卑亢失度,或者糊涂。汉奸共通的特征,或者说一切美奸、法奸、澳奸、日奸、德奸、俄奸之类人奸的共同特征,就是势利。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可以使你清楚地感到目的所在:是一份优薪,一本洋护照,还是一顿午餐。他们从来不会站在学术良心或社会责任的立场,说一句没有利益回报的废话,连耍流氓也招招实惠,决没有胆量举起手来,纠正权势者某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他们也从来没有幸福,从来不觉得身后也有幸福。他们不知道幸福其实是热情,是生命力的笑容,是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和任何时候都存在的上帝之光,辉映在正派人互相熟悉的眼神里——即便在文革时代里命贱如草的穷乡僻壤,即便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血流成河的日子,幸福也依然存在。只有可怜虫才永远自怜,嘴里只能出产呻吟。他们即便享遍满世界的福,也还会怨气冲冲,只要一转眼见到更有钱的人,还会有下跪的习惯。

我也曾经被邀去演讲。看着台下一双双蓝色的眼睛，我揣测他们想听到什么。我本来打算谈父亲的自杀，谈自己亲历的枪战和监狱，谈中国一幕幕惨剧和笑剧……我知道那最能收获西方的兴奋。但我突然愤愤地改变主意，并自觉羞愧。这羞愧不在于我说什么，而在于我为什么要那样说。

这不意味着从此对中国的苦难缄口，只意味着开口不再取悦于人。

我不能与下贱的语言同流。

六

英语并不是从来血统高贵。十一世纪，说法语的诺曼集团侵占了英国之后，英语曾被视为一种下贱的语言。英语只与穷人的事物有关，而政界和都市则流行法语，读书人更习惯拉丁语。乡下穷人喂养的“猪”是英语，城里富人吃的“猪肉”是法语，这一类差别和混杂一直保留到今天。

在宗教改革家 M·路德把《圣经》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成德文之前，德文也曾被视为世俗的语言，不配用来谈论宗教和灵魂。他以“职业”的俗义来译注“天职”，在教庭心目中简直是犯上和渎神。比他更早一点的捷克教士胡司，主张用方言作祈祷，把教义捷克语化，也构成异端罪之一。他付出了更高的代价——最后在广场上被

活活烧死。

我要说的下贱语言则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指语种，而是指语质。不是指弱势阶级或弱势民族的语言，而是指任何一种语言中都可能出现的品格退化和腐变。

这可能以貌似圣洁化的形态出现，比如在中国的“文革”。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句句红光亮。禁欲主义清除了所有描述人欲的词汇，使之进入无名状态的黑暗。这种虚伪的语言专制，只能带来生命的枯萎，带来幽默、轻松、温情、执拗等等个性的绝育。人们即使在家信和日记里，也渐渐活出社论和革命公文的样子，活出整齐呆板的格式。今天的人只要翻一翻当时的印刷品，无不惊讶字号的奇大。其实当时人们已无话可说，或者是无可话说，大量语言找不到指陈对象，只得从人们的记忆中退出——到了这一步，一个大字号的国家必然出现，用增大字号的办法来充塞版面和过于空洞的大脑，自然成了普遍的无奈。

这种语言，眼下还残留在官腔里，甚至残留在好些电脑词库里。我眼下使用的词组库就排除了大多数所谓不洁的词乃至贬义词，另一方面却全力优待褒义的、进步的、革命的词——“文革”式的洁癖甚至已遗传给今天高科技的硬卡。

但眼下语言品格的退化和腐变，在更多的地方，表现为鄙俗化倾向，表现为市井下流腔。同样是很多假话大话